

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郑艺腾, 沈伟腾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浙江省及其11个地级市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浙江省整体及其各地级市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浙江省整体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杭州和宁波的协调发展表现尤为突出;温州、绍兴、嘉兴、台州、金华、湖州、舟山的协调发展水平虽有所提升,但仍显不足;而衢州和丽水则仍处于失调状态,亟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 耦合协调模型; 营商环境; 经济增长; 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10-0199-07

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营商环境成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必然要求。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成为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复杂局面,近年来出台的相关优化政策效果渐趋式微。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该文件旨在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省份,浙江既有实力也肩负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动力的使命。数据显示,2022年浙江省的生产总值达到777.17亿元,而2023年增至825.53亿元,同比增长率达到6.0%,这一稳健的经济增长为浙江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持。因此,深入研究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

1 文献综述

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关于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主要通过以构建指标评价体系进行实证研究为

主,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从整体视角出发,探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类聚焦于区域视角,分析不同区域内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类以营商环境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结合不同因素共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吴韶华和胡振华^[1]通过构建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发现与营商环境相关的社会因素及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此外,杨巧和蒋勇^[2]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升经济体的发展质量,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奠定了重要基础。除了从整体视角进行研究,许多学者还从区域视角出发,探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曾慧等^[3]通过六个维度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探究其对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丁从明等^[4]采用南北城市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指标“两两捉对”回归的实证策略,直接识别营商环境差异对南北均衡发展的影响。李文娟等^[5]选取2010—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曾慧等^[6]和Ma和He^[7]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一带一路”沿线的广泛区域来探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随着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深入,张蕊和余进韬^[8]、曾光辉等^[9]、李

收稿日期: 2024-11-18

基金项目: 浙江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024C35085);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G2024-1-11)

作者简介: 郑艺腾(2001—),男,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营商环境、“一带一路”;通信作者沈伟腾(1991—),男,浙江嘉兴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营商环境、“一带一路”。

言和张智^[10]、Guo 等^[11]和 Yasmeen 等^[12]将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影响因素分别结合数字金融、信用监管、企业家精神、绿色经济及数字经济和环境技术等专业化领域因素共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此外,Olha^[13]还以东欧国家为例,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FDI)质量有显著影响,进而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

在确定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之后,有不少学者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中国各地区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刘新智等^[14]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发现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邓蕾^[15]运用马尔可夫链分析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的差异性及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协同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与高水平引进外资提供经验证据。此外,杨爱兵和王璐鹭^[16]、卢铁玲^[17]从区域研究视角出发,针对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不平衡问题,运用耦合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李蓉和屈莉莉^[18]还利用耦合模型以中国 9 个主要口岸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口岸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对二者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在利用耦合协调度方法分析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有研究中,部分研究侧重于分析省级下属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另一些则侧重于分析省级层面二者的协调状况。然而,鲜有研究将省级层面与下属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分别进行分析。因此,在此基础上,结合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针对浙江省及其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分析,旨在更加全面地剖析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问题。

2 指标体系构建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2.1 构建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本着科学性、系统性、相关性和可得性的原则,参考杨爱兵和王璐鹭^[16]、卢铁玲^[17]的研究成果,结合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的具体情况,选取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评估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将营商环境子系统划分为 6 个一级指标和 9 个二级指标,构建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 所示。

在评估浙江省各城市的经济水平之后,将经济增长指标体系划分为 3 个主要维度,即经济总量、产

业结构和人均生活水平^[17]。在经济总量方面,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城市财政预算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 3 个相互补充的二级指标。产业结构的评估则涵盖第一、二、三产业,以全面反映产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20]。人均生活水平则采用人均 GDP 这一关键指标来衡量居民的经济福祉,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1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单位
营商环境子系统	人力环境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万人
		从业人数	万人
	交通环境	交通发达程度	%
	市场环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亿元
	创新环境	科技支出	亿元
		专利申请授权量	件
投资环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生态环境	城市绿化率	%	

注:交通发达程度是指交通运输业就业人数占年末单位就业人数的比例,城市绿化率是指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例。

表 2 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量单位
经济增长子系统	经济总量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城市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亿元
		第二产业	亿元
		第三产业	亿元
	人均生活水平	人均 GDP	元

2.2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选取 2013—2022 年浙江省各城市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源自《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公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由于 2019—2022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未披露的各城市年末交通运输业从业人数,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采用线性拟合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合理补充。此外,浙江省统计年鉴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尚未公布 2023 年的数据,且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仅使用截至 2022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2.3 数据处理

在确定指标权重的过程中,采用熵值法来进行客观计算。考虑到收集到的数据存在单位不一致和量纲差异,这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偏离实际情况,因此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这一步骤

的目的是将所有数据转换到一个统一的范围内,即0到1之间,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具体的处理方法如下。

(1)构建数据矩阵。

假设原始数据为 n 个年份, c 个城市的 z 个指标。则原始矩阵为

$$X = \{X_{oij}\}_{(n \times c \times z)} \quad (1)$$

式中: X_{oij} 为第 o 年第 i 个城市的第 j 个指标值。

(2)数据标准化。

在进行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时,需要区分对待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指的是那些其数值越大,表示评价结果越优的指标;相反,负向指标则意味着其数值越小,评价结果更佳。针对这两种类型的指标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策略,以确保数据转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正向指标:

$$X'_{oij} = \frac{X_{oij} - X_{\min}}{X_{\max} - X_{\min}} + 0.01 \quad (2)$$

负向指标:

$$X'_{oij} = \frac{X_{\max} - X_{oij}}{X_{\max} - X_{\min}} + 0.01 \quad (3)$$

式中: X_{oij} 为原始数据; X'_{oij} 为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过后的指标值,取值区间为 $[0, 1]$; X_{\max} 为原始数据最大值; X_{\min} 为原始数据最小值。此外,极差标准化后会生成0的数据,需要对此做数据平移,某列数据最小值的绝对值+0.01,以保证数据全部为正数可正常计算^[18]。

(3)计算权重。

第 o 年第 i 个城市的第 j 个指标值占指标总体的比例为

$$P_{oij} = \frac{X'_{oij}}{\sum_{o=1}^n \sum_{i=1}^c X'_{oij}} \quad (4)$$

第 j 个指标对应的信息熵为

$$E_j = -k \sum_{o=1}^n \sum_{i=1}^c (P_{oij} \ln P_{oij}) \quad (5)$$

式中: $k=1/\ln nc, 0 \leq E_j \leq 1$, 当 $P_{oij}=0$ 时,规定 $P_{oij} \ln P_{oij}=0$ 。

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为

$$D_j = 1 - E_j \quad (6)$$

第 j 项指标的权重为

$$W_j = \frac{D_j}{\sum_{j=1}^z D_j} \quad (7)$$

如表3所示,在营商环境子系统中,人力环境和交通环境的权重较高,分别为21.24%和17.46%;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合计为47.18%;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权重较低,仅为14.12%。经济增长子系统中,经济总量的权重最高,为46.74%,产业结构为44.46%;人均生活水平的权重为8.80%。

表3 系统指标属性及其权重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权重/%
营商环境子系统	人力环境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	+	15.43
		从业人数	+	5.81
	交通环境	交通发达程度	+	17.46
	市场环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	+	5.92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	17.31
	创新环境	科技支出	+	14.97
		专利申请授权量	+	8.98
	投资环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7.47
生态环境	城市绿化率	+	6.65	
经济增长子系统	经济总量	地区生产总值	+	15.35
		城市财政预算收入	+	18.5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12.85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	12.95
		第二产业	+	12.62
		第三产业	+	18.89
	人均生活水平	人均GDP	+	8.80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一种数学工具,它专门用于评估两个或多个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运用这一模型来深入探讨浙江省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综合得分。

$$Z_{oi} = \sum_{j=1}^z W_j X'_{oij} \quad (8)$$

式中: Z_{oi} 为第 o 年第 i 个城市的综合得分。

(2)确定耦合度模型。

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模型为

$$C = \frac{2 \sqrt{U_1 U_2}}{U_1 + U_2} \quad (9)$$

式中: U_1 为营商环境的综合指数; U_2 为经济增长系统的综合指数; C 为耦合度,耦合度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耦合度值越高,代表两个系统之间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耦合度越低,表明两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性程度越低,并且 $0 \leq C \leq 1$ 。

(3)确定耦合协调度模型。

仅凭耦合度本身并不足以全面评估营商环境

与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耦合度较低并不直接意味着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差。为了准确判断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需要进一步利用耦合度来计算耦合协调度,这一指标能够提供更具体的协调关系分析。

$$D = \sqrt{CT} \quad (10)$$

$$T = \alpha U_1 + \beta U_2 \quad (11)$$

式中: D 为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T 为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指数; α 和 β 分别为营商环境和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所占的比例,因为营商环境和海洋环境同等重要,因此将 α 和 β 各取0.5, $\alpha+\beta=1$,具体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参考李小娟等^[19]研究成果,如表4所示。

表 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程度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类型	协调等级
失调衰退期	0.0~0.1	极度失调	1
	0.1~0.2	严重失调	2
	0.2~0.3	中度失调	3
	0.3~0.4	轻度失调	4
过渡转型期	0.4~0.5	濒临失调	5
	0.5~0.6	勉强协调	6
协调发展期	0.6~0.7	初级协调	7
	0.7~0.8	中级协调	8
	0.8~0.9	良好协调	9
	0.9~1.0	优质协调	10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综合发展指数

通过式(9)可以计算出2013—2022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情况。如图1所示,浙江省整体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

从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来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中首次提出“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目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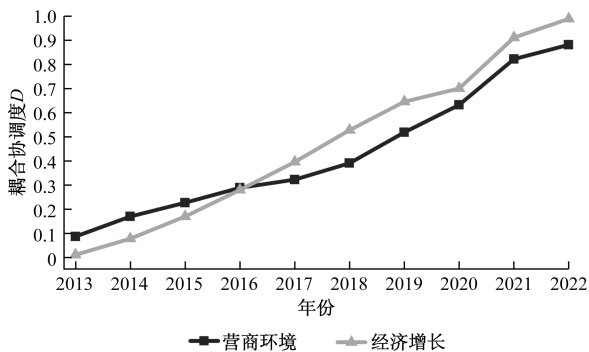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22 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情况

后,浙江省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得到大幅度提升。从2017年开始,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增长有所放缓,这主要是由于民间投资、工业投资增长速度放缓,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预期并不乐观。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等指导意见,以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因此,浙江省营商环境综合指数从2017年的0.322上升到2018年的0.390,摆脱了近年增长放缓的趋势。同时,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2021年,浙江省营商环境综合指数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以及浙江省地方政策的推动效果。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2021年发布了多条有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相关的政策文件。同时,浙江省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示,自2020年开始分别发布《浙江省实施优化营商环境“10+N”便利化行动方案(2.0版)》《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这些相关文件的发布皆在为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持。

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浙江省2013—2019年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整体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这得益于浙江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并且推动外贸进出口的增长,同时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拓展经济的发展空间。然而,2020年浙江省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有所放缓,这主要是由于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浙江省的经济受到显著的影响。面对疫情造成的冲击,2021年浙江省通过“争先创优”行动推动经济回暖,这一行动在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促进了各项经济指标的恢复和增长,确保了经济稳步复苏。同时,这一年浙江省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有显著上升趋势。

此外,营商环境和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交互发展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同时2013—2022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3—2016年,这一阶段浙江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要高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水平。第二阶段为2017—2020年,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发展水平超过营商环境发展水平,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浙江省年度GDP增速分别为7.8%、7.1%、6.8%和3.6%,均高于全国GDP增速(6.9%、6.6%、6.1%和2.3%),并且在该阶段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呈现一个“回环”的

形状,这主要是经济增长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带动了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阶段为2021—2022年,这一阶段由于疫情回暖,营商环境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发展趋势逐渐趋于相同,均表现为2021年较大幅度上升,但在2022年增幅有所放缓。

如表5所示,2013—2022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的分层指标大多数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少数指标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很快恢复增长的趋势,并且波动的幅度并不大。2022年,由于浙江省旅客周转量为491亿人km,比上年下降了31.2%,这导致交通环境综合指数从2021年的0.1746下降至0.1174,下降幅度达到48.72%。综合来看,浙江省在2013—2022这段时间内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特别是在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方面,增长尤为显著。

3.2 耦合协调度

根据式(10)~式(12)可以计算出2013—2022年浙江省整体及其11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系统和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综合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浙江省整体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13—2014年为“失调衰退期”;第二阶段2015—2016年为“过渡转型期”;第三阶段2017—2022年为“协调发展期”。

具体来看,2013—2022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和提升。如表6所示,浙江省的耦合度 C 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表明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两系统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此外,综合协调系数 T 和耦合协调度 D 也表现逐年提高的趋势。

2013年,浙江省的耦合协调发展处于“严重失

调”状态,耦合协调度仅为0.171,表明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型较弱。因此,浙江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包括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优化市场准入准营机制等一系列优化政策。至2014年和2015年,浙江省的耦合协调类型分别进入“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阶段,显示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正在逐步改善。2016年,浙江省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这一转变标志着浙江省在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开始显现成效。2017—2022年,浙江省的耦合协调类型连续保持在“协调发展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在2022年达到0.966,达到“优质协调”水平,这一变化反映浙江省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有效行动。

如表7所示,2013—2022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提升趋势。杭州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从2013年的0.682增长至2022年的0.940,这一跃升表明杭州市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此外,宁波的协调发展水平也有所提升,从2013年的0.590增长至2022年的0.803,从过渡转型期进入协调发展期。然而,温

表6 2013—2022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年份	C	T	D	协调类型	协调程度
2013	0.610	0.048	0.171	严重失调	失调衰退期
2014	0.926	0.123	0.337	轻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2015	0.989	0.197	0.442	濒临失调	过渡转型期
2016	1.000	0.284	0.532	勉强协调	过渡转型期
2017	0.995	0.358	0.597	勉强协调	协调发展期
2018	0.989	0.459	0.673	初级协调	协调发展期
2019	0.994	0.581	0.760	中级协调	协调发展期
2020	0.999	0.666	0.815	良好协调	协调发展期
2021	0.999	0.866	0.930	优质协调	协调发展期
2022	0.998	0.935	0.966	优质协调	协调发展期

表5 2013—2022年浙江省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分层指标综合发展指数

年份	营商环境子系统						经济增长子系统		
	人力环境	交通环境	市场环境	创新环境	投资环境	生态环境	经济总量	产业结构	生活水平
2013	0.0475	0.0293	0.0023	0.0060	0.0007	0.0007	0.0047	0.0044	0.0009
2014	0.0538	0.0423	0.0517	0.0084	0.0102	0.0029	0.0409	0.0286	0.0071
2015	0.0517	0.0328	0.0812	0.0363	0.0194	0.0044	0.0949	0.0609	0.0130
2016	0.0636	0.0247	0.1235	0.0383	0.0277	0.0108	0.1492	0.1091	0.0203
2017	0.0730	0.0236	0.1378	0.0471	0.0325	0.0083	0.2058	0.1578	0.0309
2018	0.0869	0.0017	0.1533	0.0942	0.0355	0.0186	0.2774	0.2072	0.0426
2019	0.0920	0.0355	0.1605	0.1318	0.0454	0.0525	0.3301	0.2640	0.0510
2020	0.0944	0.1580	0.1183	0.1573	0.0512	0.0522	0.3440	0.3002	0.0560
2021	0.1367	0.1746	0.1825	0.2109	0.0634	0.0536	0.4425	0.3906	0.0782
2022	0.1578	0.1174	0.2323	0.2329	0.0747	0.0665	0.4561	0.4445	0.0881

表 7 2013—2022 浙江省各地级市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城市	2013 年					2022 年				
	C	T	D	协调类型	协调程度	C	T	D	协调类型	协调程度
杭州	0.998	0.466	0.682	初级协调	协调发展期	0.998	0.885	0.940	优质协调	协调发展期
宁波	0.998	0.349	0.590	勉强协调	过渡转型期	0.979	0.658	0.803	良好协调	协调发展期
温州	0.998	0.159	0.399	轻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97	0.325	0.569	勉强协调	过渡转型期
绍兴	0.999	0.179	0.423	濒临失调	过渡转型期	0.986	0.323	0.564	勉强协调	过渡转型期
嘉兴	0.996	0.149	0.385	轻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93	0.279	0.527	勉强协调	过渡转型期
台州	0.984	0.130	0.358	轻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39	0.252	0.486	濒临失调	过渡转型期
金华	0.996	0.120	0.346	轻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78	0.234	0.478	濒临失调	过渡转型期
湖州	0.982	0.094	0.304	轻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88	0.181	0.423	濒临失调	过渡转型期
衢州	0.876	0.025	0.148	严重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86	0.074	0.270	中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舟山	0.870	0.062	0.232	中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1.000	0.165	0.406	濒临失调	过渡转型期
丽水	0.870	0.018	0.125	严重失调	失调衰退期	0.999	0.077	0.278	中度失调	失调衰退期

州、绍兴、嘉兴、台州、金华、湖州、舟山的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较为有限。衢州和丽水的协调发展水平在 2022 年仍处于失调阶段。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以及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总体来看,浙江省各地级市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上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杭州和宁波表现尤为突出,而其他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提升,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选取 2013—2022 年浙江省及其 1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系统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及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浙江省整体以及各地级市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浙江省营商环境和经济增长指数均显著提升,分三个阶段:2013—2016 年,营商环境改善超前于经济增长;2017—2020 年,经济增长反超并推动营商环境优化;2021—2022 年,疫情后两者同步回暖,尽管 2022 年增速放缓,但整体仍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2013—2022 年浙江省总体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从低水平提升至优质水平,实现从失调到协调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中,杭州和宁波表现突出。然而,其他城市如温州、绍兴、嘉兴等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限,衢州和丽水仍处于失调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加大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

4.2 建议

(1)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产业升级。浙江省在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持续改革和优化的挑战。继续深化行政改革,简化企业开办和运营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特别是对于耦合协调度发展较慢的城市,如温州、绍兴、嘉兴、台州、金华、湖州、衢州、舟山和丽水,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资源共享和产业互补,以提升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同时,这些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集群。

(2)强化创新驱动与人才支持。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浙江省而言,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人才作为创新的核心资源,通过优化人才政策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此外,加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管理能力,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人才高地,加强数字化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数据辅助决策能力,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治理的新期待。

(3)深化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和竞争,以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同时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扩展境外营销网络等方式,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不仅能够推动外贸和外资的高质量发展,还能在全球经济中提升其地位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吴韶华, 胡振华. 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新经济, 2022(9): 86-91.
- [2] 杨巧, 蒋勇. 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J].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44(4): 17-29.
- [3] 曾慧, 贾丽娜, 胡韵齐. 浙江省地级城市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及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23(6): 14-18.
- [4] 丁从明, 王聪, 陈昊.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南北经济均衡发展——限制经济秩序向开放经济秩序的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1): 110-129.
- [5] 李文娟, 彭建涛, 马吉光. 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3(8): 13-15.
- [6] 曾慧, 郭慧聪, 郑倩倩. 优化营商环境能否促进经济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J]. 统计理论与实践, 2024(2): 20-28.
- [7] MA J, HE Z.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4, 69: 106021.
- [8] 张蕊, 余进韬.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7): 1-9.
- [9] 曾光辉, 王荣, 王赫. 信用监管、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J]. 工业技术经济, 2022, 41(1): 12-20.
- [10] 李言, 张智.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宏观质量研究, 2021, 9(4): 48-63.
- [11] GUO P, HE Y, SCRIMGEOUR F, et al. The impact of natural resource dependency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a business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4, 208: 123680.
- [12] YASMEEN R, TIAN T, YAN H, et al. A simultaneous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environment technology, business activity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7: moderating role of institutions [J]. Heliyon, 2024, 10(12): e32932.
- [13] OLHA Z. A study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DI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n europe [J].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24, 12(2): 1158-1189.
- [14] 刘新智, 黎佩雨, 周韩梅. 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4): 68-73.
- [15] 邓蕾. 我国省域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效应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6): 189-192.
- [16] 杨爱兵, 王璐鹭. 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5(4): 8-14.
- [17] 卢铁玲. 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分析——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22, 22(8): 348-351.
- [18] 李蓉, 屈莉莉. 口岸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分析[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18): 132-138.
- [19] 李小娟, 王大娟, 王长梅. 怀化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性研究[J]. 经济地理, 2023, 43(11): 190-197.
- [20] ZHANG K, JIN Y, LI D, et al.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ies [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4, 111: 105561.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Zhejiang Province

ZHENG Yiteng, SHEN Weiteng

(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0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3 to 202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whole and in each prefecture-level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mong them,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and Ningbo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Wenzhou, Shaoxing, Jiaying, Taizhou, Jinhua, Huzhou and Zhoushan has been improved, but it is still insufficient. Quzhou and Lishui are still in a state of imbalance, and it is urgent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Zhejiang Province